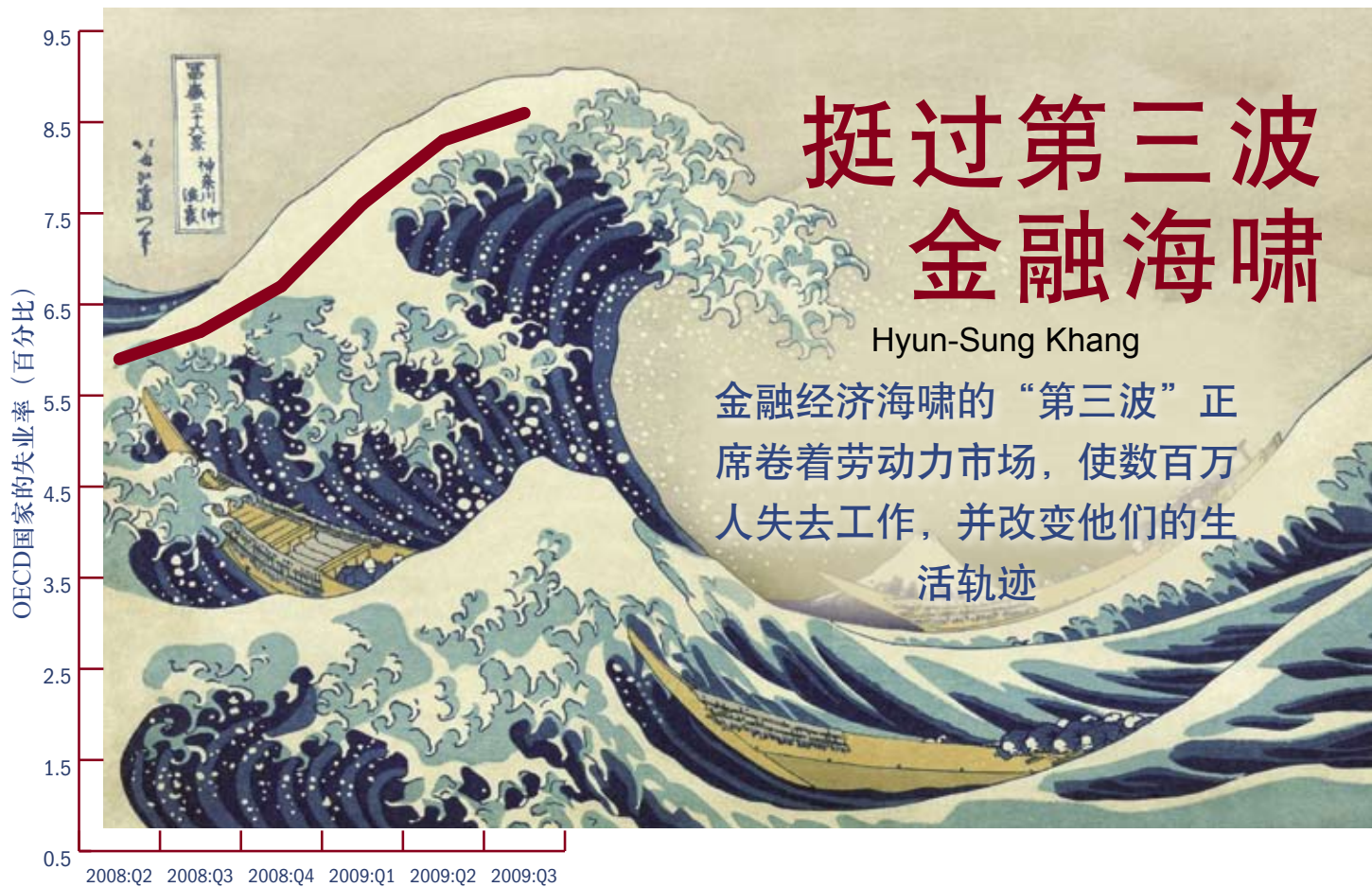




挺过第三波 金融海啸

Hyun-Sung Khang

金融经济海啸的“第三波”正席卷着劳动力市场，使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并改变他们的生活轨迹

泽基·克勒奇是一名发电厂操作员，当他所在的公司为了抵御全球经济衰退而宣布实行短工制时，他却不敢将这一情况告诉妻子。钢铁需求暴跌使得他所在的公司——德国工业集团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无法保持全员满负荷生产，但又不想解雇高素质员工，所以公司引入短工制，即德语中的Kurzarbeit。

克勒奇说：“我们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人人都在谈论世界经济危机，你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克勒奇不愿意将公司实行短工制的消息告诉妻子，因为他担心短工制只不过是解雇的前奏。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全球危机的余波正在冲击全球劳动力市场，数千万人已经失去了工作，还有数百万人即将步其后尘。虽然很多国家正在缓慢恢复经济的正增长，但对于许多人来说，最坏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说：“想想那些将在未来几个月中失业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危机没有过去，而是即将到来。”他认为，在首先击垮金融市场并迅速波及到其他经济领域之后，危机的第三波已经露出端倪，将会对就业市场造成冲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斯特法诺·斯卡佩特说：“OECD地区失业加剧的速度和程度都是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只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经济萧条时期才出现过类似情况。”OECD推测失业增

长将持续到明年年末。如果这个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在OECD的30个成员国中，失业人口将较本次经济衰退开始时增加2000万，这样快速的失业增长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产出最终将会复苏，但是失业的风险很可能将持续存在。即使最终有新的工作职位产生，但是这场衰退对数百万无法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年轻人将终生与低工资相伴；而对那些本来工作就很难有保障的临时工而言，处境更加不稳定；此外，无业人员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他们及家人将因为就业问题蒙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影响因地而异

全球经济下滑对失业的影响在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影响并不局限在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的失业率已经突破了10%的重要心理关口，而起初仅将美国金融危机视为“太平洋彼岸的火灾”的日本在危机中的失业率也创下了新高。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荷兰的失业率仅为3.6%，按OECD调整后的失业率计算，同比增长不足一个百分点。

在全球需求下降和某些重要商品价格暴跌的共同作用下，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遭遇了近20年来的首次衰退。据南非统计局称，受本次衰退影响，全国有

大约1/4的人口缺少工作。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加难以确定，而且即使其中某些国家确实存在相关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也无法完全真实反映复杂的社会图景，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人们所承受的困苦。发展中国家失业工人的生活将无以为继，危机中人们经常被迫从事低生产率、低报酬的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ILO，总部位于日内瓦）的邓肯·坎贝尔回忆了他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泰国工作的经历，当时，与预期相反，失业率出现下降。他说，“含有演绎成分的证据表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类似于以下情况：在失去工作后，泰国工厂的工人会在街头摆摊，还拉上自己的妻子和原本在学校读书的孩子照顾摊位。所以，虽然失业率没有上升，但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中的穷人越来越多，与收入相关的不充分就业加剧，就业情况愈发脆弱。”

愤懑的年轻人

失业的影响也因部门和工作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历史情况表明，移民以及低技能、临时性和年纪较大的工作者会首先遭受失业的打击。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大量年轻人刚离开高中和大学就找不到工作。ILO曾做出预警，世界范围的青年失业率将从2008年的12%上升到2009年的15%。在西班牙，青少年和青年的失业率几乎达到40%。

失业会给人造成多年难以愈合的伤痕，甚至会影响他们的整个工作生涯，尤其对那些刚刚起步就遭遇失业的人伤害更大。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戴维·埃尔伍德曾经写道：“一段时期失业的影响并不会因为找到工作而消失”（埃尔伍德，1982）。埃尔伍德以及其后的其他经济学家得出结论的表明，早期失业会影响工作者对工作的期望，并使他们整个工作生涯的工资减少：某个阶段工作记录的缺失降低了他们被雇用的可能性，同时，理想的破灭和绝望的情绪也会对他们寻找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工作不稳定的临时工作者

与年轻人一起排在就业队伍中的还有临时性工作者。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障有限，一旦失业就会变得极其拮据。OECD国家的许多公司在经济繁荣时期都大量雇用临时性工作者，这主要是为了规避雇用和解雇法规的限制。临时性工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在日本等国最为严重，因为在这些国家，住房是就业待遇的一部分。《金融与发展》2009年9月号中佐藤义则（Yoshinori Sato）的例子就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佐藤义则（Yoshinori Sato）是一位汽车装配工人，在失去工作的同时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困境，因为他必

须在四天内搬出公司提供的宿舍。

据OECD计算，2008年10月以来，在日本15.8万名被解雇的员工中约有95%是非正式工作者（兼职工、临时工和合同工，从其他公司借用的人员，以及经中介雇用的人员）。这些人通常没有资格获得由公司支付的离职金或失业保险。与日本类似，法国和芬兰的临时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也很不稳定。这三个国家的政府正在努力改善非正式工作人口的生存困境。

危机对女性的影响与日俱增

在危机的早期阶段，大规模裁员首先发生在建筑业和制造业。由于这两个行业以男性为主，因此在这个阶段男性受到的失业打击要远远高于女性。但是随着发达国家工作岗位的不断减少，女性也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失业浪潮中。例如在美国，女性占很大比重的服务业的失业占整体失业比重的一半。

在较为富裕的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可能将很快面临失业，而与此相悖的是，在贫困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却被迫重新开始工作，这偏离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历史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很高。但是随着国家不断发展，生产活动从家庭、家庭农场和小生意向更广阔的市场转移，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会出现下降。之后，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女性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大量女性又开始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女性的劳动力参与通常被描述为U型。坎贝尔说：“在经济衰退中，U型就发生变形，可能会变得平缓。”

“无就业”复苏？

虽然失业是经济的一个滞后指标，但令人担忧的是，就业不会随经济增长出现相应变化，即伴随增长减缓、信贷成本上升，高水平的结构性失业（或者至少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从历史上看，当一个经济体摆脱衰退后，经济复苏通常也伴有就业增长。然而，安道尔法图和麦克唐纳（2004）指出，在美国最近的两次经济衰退结束后，就业增长复苏都比GDP复苏滞后数个季度，这种现象被称为“无就业复苏”。杜克大学经济学家威廉姆·达里缔等人对此提法十分不屑，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说法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威廉姆·达里缔主要研究失业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只有能够创造工作岗位的复苏才能算得上是有意义的复苏。

人们对这种就业减少的经济复苏现象有很多解释。在衰退结束后，自然失业率可能达到最高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工人从夕阳行业转向朝阳行

业时技能转变而引发的动荡效应(churning effect)造成的,然而或许这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正反映了科技带来的效率提升。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该机构的职责之一是正式确认美国历次经济危机的结束时间)的罗伯特·戈登认为,无就业复苏现象源于经济扩张的最后阶段企业具有过度雇用的倾向,在经济危机结束后劳动力的积累就开始产生影响,该“扩张终结效应”能在不增加相应劳动力的情况下实现产出增长(戈登,1993)。

戈登在后来的著作中还提出了一个补充性的假说,即“早期复苏生产力泡沫”,并将之称为无就业复苏的必然结果。“在复苏的前几个季度中,盈利仍然艰难,企业会积极地降低劳动力投入以削减成本”

(戈登,2003),因此就出现了利用较少的工人实现产出增加的现象。他认为,美国的经济衰退在2009年6月份已经结束,同时他也坚信发达国家将出现无就业复苏,也许这些国家目前业已处于复苏来临前的“阵痛”阶段。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戈登认为2010年年初就业将恢复正增长。而其他人士则较为悲观,认为许多经济体目前都笼罩着结构性高失业率的阴霾。经济衰退等短暂冲击的持久效应包含在“滞后”这一概念中。传统上,经济学家们认为高失业率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失业会促使人们降低自己的工资要求,之后新的工作岗位会产生,失业率则相应降低。但是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劳伦斯·萨默斯在20多年前撰写的论文(布兰查德和萨默斯,1986)中明确指出,失业率具有棘轮效应。

经济学家们一直争论失业率是否滞后,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这一争论的结果更加倾向于最新的棘轮效应理论。布兰查德(现任IMF首席经济学家)表示,自己目前仍然不能确定滞后效应发挥作用的具体渠道。在过去的20多年间,他通过各种方式探讨过以下问题:工资谈判的局内一局外人理论的可能性(这种理论认为在职的工作者会提高自己的工资目标,防止失业者重回工作岗位)、失业者(或无法就业的人)的行为变化,以及最近探讨的在危机最严重时政府采取的失业保障措施。布兰查德认为,上述种种情况都会挫伤失业者重返工作的信心和勇气。他说:“虽然造成失业的因素远去了,但是体制结构仍然没有变化。当你实施了这些做法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扰乱了劳动力市场。”

就业率“滞后”概念的创始人对本次危机中的“滞后”作用持怀疑态度。(布兰查德发现,复苏的缓慢进程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他说:“产出增长



泽基·克勒奇就职于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

将处于低水平,生产效率增长将处于正常水平,就业增长的幅度将非常小。”)但是其他人,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劳伦斯·鲍尔,则认为滞后作用可能是未来失业率仍将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鲍尔说:“由于美国的利率接近零,干预本次危机的空间已没有,因此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将要承受滞后效应的原因所在。”

长期失业的影响

长期失业会对失业者以及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虽然少数经济学家曾研究过经济衰退的正外部性)。长期失业所产生的问题非常直观。失业很久的工作者会丧失工作技能,很难赶上工作实践发展的需要,与工作环境的联系也会减弱;而且即使他们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其工作效率和熟练程度也会不如从前。

气馁的求职者可能会彻底撤离劳动力市场。据美国当期人口调查的一项分析估计,在2003年所有结束失业状态的人中,近一半彻底退出了劳动力市场(Ilg, 2005)。OECD认为,2/3的欧洲大陆失业人口在失业超过一年后将不会再重回职场。

政府对策

长期失业不仅使个人,而且使国家大幅增加社会和财政成本,因此许多政府都积极采取措施,向各类就业扶持计划注入相当大比例的刺激性资金,帮助失业者重新获得就业机会。各国政府根据自己的财政状况、政治倾向以及文化偏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包括创建公共部门工作岗位、实施再培训计划,以及通过

税收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增加雇用人数等。

例如，印度政府将《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中的预算增加了一倍，据此每年向愿意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公共事业工程提供体力劳动的农村家庭成员（男性或女性皆可）提供100个工作日的工作。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隆宣布针对公共工程投资进行改革，以简化手续和降低成本，从而促进就业增长。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正考虑明年面向新雇用行为提供税收信贷。

近年来，许多政府都积极落实面向岗位供应方的措施，包括削减工会权力、弱化官僚作风以及推出昂贵的培训计划等，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就业。这种政策路线借鉴了20世纪70年代的惨痛教训：那时，许多国家都试图通过推行面向需求方的政策来克服石油危机造成的后果，但是最终却加剧了通货膨胀。如今已达到历史最低水平的利率和财政赤字限制了某些政府调控的余地。不过，保护就业的措施效果参差不齐，而且政府通常在危机最严峻的形势下对工作者施以援手，这更多是迫于政治压力而非追求富有成效的结果。

降低失业的捷径？

事实证明，对潜在失业者在职时进行干预的成本要比坐等其失业后才提供失业津贴或昂贵（甚至被怀疑是无效的）就业培训低得多。例如，短工制就是欧元区最受欢迎的就业保护措施之一，被支持者誉为应对危机的正确措施，可以帮助许多面临短期需求大幅下降和信贷困难双重压力的公司度过当前的困境。据OECD统计，其30个成员国中已经有22个实施了不同形式的短工制。德国的版本为Kurzarbeit，其目的是为了

使雇员、雇主和政府共同分担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这就是泽基·克勒奇所在的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采用的制度——缩短工人的工作时数，由政府 and 雇主共同支付工人工资。这个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工人的时薪会跳跃式上升，而且上涨幅度可能会很大（这是批评家们指摘的重点）。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的目标是将所有员工的工资损失控制在10%以内。以克勒奇为例，在Kurzarbeit全面生效时，他的工作时间将减少到平时的3/4，但其每月工资收入只会减少约10%。

短工制是全职就业与失业之间的缓冲区，其经济意义在于保持工人对复兴的期盼，同时避免支付在危机中解雇工人和在危机结束后重新雇用工人所产生的成本。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的发言人说：“如果没有Kurzarbeit，我们几乎肯定会出现大规模裁员。而如果你在经济危机中裁员，等到订单增加时，你就会缺乏专业劳动力，我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但有批评家指出Kurzarbeit是一个昂贵的解决方案，经常无法带来最高效的结果。此外，短工制补贴

措施的实施也并非总是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补贴通常会被雇主用来培训那些公司本来就计划培训的员工，或者最终被用于支持那些即使经济环境改善后也无力生存的公司。IMF的马丁·辛德勒说：“这对政府而言可能是一项成本高昂的措施，并且至少会带来延误必需的结构化变革的危险。”

将不同的失业模式进行对比，有助于探讨创设和保护工作岗位的最佳方式。欧洲的失业率虽然一开始高于美国，但增长比美国迟缓。欧元区目前的失业率为9.7%（最新的可用数据），较本轮失业周期的最低点（21个月以前）仅增加了2.5个百分点。而美国在同期的失业率则增加了近5个百分点。欧洲的就模式曾被批评为僵化死板，不如美国的雇用—解雇模式灵活机动，但是如今则获得了青睐和信任。

关于各种经济模式相对优势的争论刚刚开始。例如，在短工制等措施实施的过程中，德国仍然可能遇到失业率急剧上升的情况，经济危机的周期将决定Kurzarbeit是否有效。辛德勒说：“财政支持将会耗尽，这些措施是能够真正避免失业还是仅仅延缓失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复苏的速度。”

但是对克勒奇来说，短工制毫无疑问挽救了他的工作，虽然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尚未恢复全部生产能力，但他的同事们已经结束了为期六个月的短工制，于8月份恢复了全职工作。

他说：“Kurzarbeit的确很有帮助，这一点很明显。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困境，如果没有它，结局不会这么好。” ■

Hyun-Sung Khang是《金融与发展》的高级编辑。

参考文献：

- Andolfatto, David, and Glenn MacDonald, 2004, “Jobless Recoveries,” *EconWPA Macroeconomics Paper* 0412014.
- Blanchard, Olivier J., and Lawrence H. Summers, 1986, *Hysteresis and the European Unemployment Problem*,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pp. 15–77.
- Ellwood, David, 1982, “Teenage Unemployment: Permanent Scars or Temporary Blemishes?” in *The Youth Labor Market: Its Natur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ed. by Richard B. Freeman and David A. W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49–85.
- Gordon, Robert J., 1993, “The Jobless Recovery: Does It Signal a New Era of Productivity-Led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24, No. 1, pp. 271–316.
- , 2003, “Exploding Productivity Growth: Context,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34, No. 2, pp. 207–79.
- Ilg, Randy, 2005, “Analyzing CPS Data Using Gross Flows,” *Monthly Labor Review*, Vol. 128, No. 9, pp. 10–18.